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現象學倫理學 – 從優納斯、漢娜鄂蘭、海德格向胡塞爾回 溯(III-I)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4-013-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10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計畫主持人：汪文聖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2 月 2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現象學倫理學 – 從優納斯、漢納鄂蘭、海德格向胡塞爾回溯 (III-I)

Phenomenological Ethics – Retrospection from Jonas, Arendt, Heidegger to Husserl

計畫類別：一般型研究計畫 (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3-2411-H-004-013

執行期間：93 年 8 月 1 日至 94 年 10 月 31 日

主持人：汪文聖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之附件

無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現象學倫理學 – 從優納斯、漢納鄂蘭、海德格向胡塞爾回溯 (III-I)

Phenomenological Ethics – Retrospection from Jonas, Arendt, Heidegger to Husserl

計畫類別：一般型研究計畫 (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3-2411-H-004-013

執行期間：93 年 8 月 1 日至 94 年 10 月 31 日

主持人：汪文聖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

江偉峰：碩士生兼任助理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周晏伊：碩士生兼任助理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一、中文摘要

本年度研究計畫為三年期研究的第一階段，旨在從後胡塞爾現象學的倫理學課題出發，以回頭看胡塞爾倫理學本身的發展特色與所蘊含的潛在意義——而這個潛在意義就實現在後胡塞爾的倫理學課題中。

首先，優納斯在受到海德格此有 (Dasein) 的概念影響下，責任倫理可視對於康德倫理學的改革，無上命令的對象從人擴延到具永續性的、作為善自身的自然之存在，而與亞里斯多德倫理觀念有更大的親近性。

其次鄂蘭強調政治生活的言談、辯論與商議，重視一般公民之道德理性能力，因而其中亦蘊含約定俗成之倫理 (風俗習尚) 為政治生活的思想前提的意義。至於政治生活所強調的寬恕 (forgiving) 與承諾 (promise)，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愛與自由

價值，當然也要從習俗風尚中獲取其養份。

最後海德格針對技術性或表象性思維提出居住性或沉思性 (besinnendes) 思維的重要，以之可奠立真正的倫理學，而真正的倫理賦予我們具備向無限的可能性敞開，以取得事物無盡豐富意義的能力。但海德格根本上是將實踐置於本真的技藝基礎上，也就是建立在從人為過渡到自然的藝術之基礎上。

優納斯、鄂蘭與海德格的倫理思想固有分別強調科技性倫理、政治性倫理與藝術性倫理之差別，但皆重視人如何從存有論處境來看倫理德行的養成或發生的過程。這將為爾後探討胡塞爾倫理學的發展意義做準備。

**關鍵詞：**倫理學、現象學、優納斯、鄂蘭、海德格、技術、政治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three-year-term project. Starting from some topics of the post-Husserlian phenomenological ethics, it purposes to retrospect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ication of Husserl's ethics itself. For this implication is just actualized in the post-Husserlian phenomenological ethics.

Firs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otion of Heidegger's Dasein, Jonas' concep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 can be seen as a reformed Kantian ethics. What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originally refers is now extended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tinuous and self-good nature. In this respect Jonas' thinking is near to Aristotle's.

Second, Arendt emphasizes talking, debate and negotiation as the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political life, and emphasizes the rationally ethical ability of the normal people. So for her the conventional ethics (habitual virtue) is the presupposition for the political life. As for she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t forgiving and promise, and within the implicated love and freedom in the political life, these naturally acquire their nutriment from the habitual virtue.

Lastly, Heidegger proposes in contrast to the technical or representative thinking the living (wohnendes) or reflecting (besinnendes) thinking for grounding the authentic ethics. This ethics provides us with the ability of opening to infinite possibility and of gaining the boundless meanings of things. But for Heidegger, praxis is basically based on the authentic technique, namely the art that plays the role of transition from the man-made to the natural thing.

Jonas, Arendt and Heidegger indeed stress respectively the technological ethics, political ethics and artistic ethics. But they all take care of the process or genesis by which the virtue is educated from our existential situation. This research is prepared for the later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sserl's ethics.

**Keywords:** Ethics, Phenomenology, Jonas, Arendt, Husserl, Technology, Politics

## 二、緣由與目的

在現象學界對於倫理學的討論中，一般不是對照於康德的形式倫理學而提出馬克斯謝勒 (Max Scheler) 的質料性倫理學，就是針對於海德格的非倫理學而強調列維納斯 (Levinas) 的「哲學即是倫理學」的命題。雖然對於優納斯的「責任倫理」，國內已漸為學者所重視，而鄂蘭的政治哲學也漸有學者涉入研究；但對於此二學者的倫理學面相做更積極的研究，以及將之銜接到海德格本身已具有的原初倫理學意涵，以觀察其間的異同，實值得做進一步的探討。並且，當胡塞爾現象學中有關倫理的論述陸續被揭發與研究時，對於它如何與其現象學之後繼者海德格、鄂蘭與優納斯之間形成系譜的關係，以及我們是否可就後來的倫理學立場來瞭解胡塞爾倫理學的發展與意義等諸問題，這些亦頗值得我們去回應。

本年度的計畫在從優納斯、鄂蘭所分別重視的課題追溯與海德格思想之間的關係，並集中在倫理的思想方面。當然海德格哲學的倫理意涵將首先被揭示，其如何被歸為存有論的立場與和亞里斯多德倫理理念有如何的親近關係，將成為和鄂蘭與

優納斯之間關連的研究焦點。故而此存有論立場的倫理學將作為爾後探討胡塞爾現象學倫理學從靜態到發生學理解的根據。這是此年度研究階段的主要目的。

### 三、結果與討論

優納斯如何與亞里斯多德有著哲學的親近性呢？如亞里斯多德一樣，優納斯以為一切精神之努力立於生物學的——或更好說為自然目的性的——基礎上，作為導向與確保地球永續存在的手段；理性與合理的判斷與天生的生命指令本身連繫在一起。<sup>1</sup>當海德格面對科技問題，提出「只有一個上帝可拯救我們」（《明鏡》雜誌訪問）時，優納斯不只以為如此對神明的期待畢竟可能會失望，他更雖在海德格重存在性的影響下，更信賴人的實踐理性（實踐智）之力量。優納斯的責任倫理企圖為亞氏之實踐智（*phronesis*）的必要性與有效性做辯護，在面對海德格命定性觀點下去復興與操練這種實踐智。<sup>2</sup>

進一步言，優納斯在其對「生命現象」（*The phenomenon of life*）的觀察下，提出在人以外的世界亦有目的性，如植物的新陳代謝現象（外來物質被吸收同化於生命體內）即表示世界為偶發與必然之目的性所支配。優納斯對於已原始地具體化在新陳代謝的動態過程中之存活指令做哲學的表述。他觀察到生命的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作為方向一直支配著新陳代謝的活動，以為我們應該去思考如何面對死亡的威脅以及摧毀生命的虛無主義的挑戰，邁向自己生命的永續存在。這個挑戰包括德國納粹（以為可對生命的目的

性強化以解決其種族存活需求）及全球科技化。<sup>3</sup>優納斯兼顧了科技與倫理的平衡問題，他瞭解到面對不可預測的速度與範圍之科技革命時，我們所做的新的以及不變的選擇。科技決定性地改變了人之可能行動的維度，將我們抉擇的後續結果就時間、空間，甚至就存有論言皆擴延到人之所能干預與控制以外的領域去。鑒於彼此調適行為以及短期行為結果的傳統倫理責任無法面對科技帶來的倫理責任問題，今優納斯所提出的責任不只針對他人，也針對我們存活所賴的自然，當然包括在發生/世代中被規定的、可操練倫理抉擇的我們人類，對於這種責任的提出過去的倫理並不足以為之。<sup>4</sup>康德的無上令式：「要這樣行為，以致你可願你的行為格律成為普遍法則的原理。」轉變為：「要這樣行為，以致你的行為結果與真正人類生命的永續性相容一致。」或「在你目前的抉擇中包含了人類未來整體納入你的意願對象中。」<sup>5</sup>

比之康德之倫理訴諸個體與私有的人民，優納斯之倫理則較具集體與政治性，他訴諸政治家，回復到亞里斯多德之倫理與政治不分的理念；將倫理置入自然哲學中，人性成為自然之部份。亞氏謂對於同伴的負責與對自然經營的負責不可分，後者的延續性影響著人類持續的存活（亞氏論友誼曾以父母對子女〔被生產者〕的愛為典範），故只有對亞氏思想中廣義的倫理面相恢復，才適合此時需要。<sup>6</sup>

綜言之，優納斯建立一種重視未來、自然目的性、謙卑，提出政治決策的基本命題為：「人類整體的存在或本質不宜作為行為的賭注」，並以兩種對立的責任型態a) 政治家責任的自覺性，與 b) 父母對子女

<sup>1</sup> 參考Levy, David J., *Hans Jonas – The Integrity of Thinking*,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 pp. 5-6。

<sup>2</sup> *Ibid.* p. 9.

<sup>3</sup> *Ibid.* p. 79.

<sup>4</sup> *Ibid.* p. 83.

<sup>5</sup> *Ibid.* p. 87.

<sup>6</sup> *Ibid.* pp. 88-89.

責任的自然性為依據的責任倫理；它在建立人類幸福的「總體性」、「連續性」與「未來性」。<sup>7</sup>

鄂蘭自 50 年度末開始對政治理論做基礎性的再造，先是對從柏拉圖至馬克斯的批判與解構，再是對行動生活 (vita activa) 基本元素做現象學的描述，以為西方長期以來將 labor、work 與 action 做了異質的混淆<sup>8</sup>。她以為人不是致力於永恆性 (eternity)，不是以沉思冥觀超越此岸/世而達彼岸/來世<sup>9</sup>。相反的，人以勞動 (labor)、工作 (work)、行動 (action) 讓自然物、人造物與政治世界留傳後世以成不朽/不死性 (immortality)，它們是人的條件 (human conditions)，合稱 vita activa (行為生活)。其中行動建立與保存政治實體，創造著記憶與歷史；行動是生的最根本條件，它蘊含在人的所有行為中：勞動維持的生命需要工作所賦的世界來支援，人成為工匠人 (homo faber) 後需要在行動中再賦予意義<sup>10</sup>；而行動需要人彼此間的言談；言談溝通需要參與者的寬容與自由之心態，它們在政治生活與公共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唯在愛與自由中才得以顯示在新的生命中，得以在此岸產生真正的不朽性<sup>11</sup>。不朽性是人從死的角色轉為生的角色；故有謂：「人雖會死，但出生並不是為了死亡，而是為了新的開始。」(Man, though they must die, are not born in order to die but in order to begin.)<sup>12</sup>

<sup>7</sup> Hans Jonas. *Das Prinzip der Verantwortung*,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7, S. 15, 140-143, 54-56, 81, 84-86, 178-184..

<sup>8</sup> Dana R. Villa. "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rendt's political thought", in : Villa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1, p. 8.

<sup>9</sup> Hannah Arendt. *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en Leben*, München/Zürich: Piper, 1999. S. 28-32.

<sup>10</sup> Ebd. S. 14-18.

<sup>11</sup> Ebd. S. 301-303, 308-312.

<sup>12</sup> Ebd. S. 316.

雖然晚期因鑒於對 Adolf Eichmann 的審判 (1961)，她從政治行動意義的解釋進展到對思想、意志與判斷所扮演角色的考慮：它們不只運作在道德與政治生活中，更以獨立能力造就我們精神的生活。繼而對於行動與精神生活孰重孰輕，或是否有一和解的立場之可能，鄂蘭在 *The Life of Mind* 第三卷〈判斷〉做了討論。但對於從事非關涉世界性的思想與判斷之哲學家仍不持信任，對她似只有蘇格拉底能同時兼顧事實與理念的思想。她強調政治生活的言談、辯論與商議，顯然重視一般公民之道德理性能力；也認為公民的生活與哲學的生活不易綜合，其間做選擇有不可避免的悲劇。故鄂蘭重點仍在政治生活，關懷著世界，致力於行動地維護世界性的自由。<sup>13</sup>

鑒於鄂蘭已提出康德之「擴展的思維方式」或「反思判斷力」概念的政治意涵，克勞斯黑爾德 (Klaus Held)<sup>14</sup> 再從現象學的思想對之做更細緻的闡釋。當我們對於未來下判斷時，我們的決定有著適當或不適當的時機 (kairos)，適當的時機可為反思判斷力所評估。若我們能從個人所落入的習慣性視域中超越而出，繼而從一共同的習慣性視域著眼，始能下出適合時機的判斷。希臘人稱共同習慣的整體為 êthos，它尚不至於為道德 (morality)，但具約束人類社群的實踐標準，它以前對象、前顯題的方式為社群成員所熟悉，可稱為良好習俗或習俗倫理，希臘人又稱為德行 (aretai; virtues)；它們是政治上意見爭辯討論的共同基礎。Kairos (新的) 在 êthos (舊

<sup>13</sup> Dana R. Villa. "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rendt's political thought", pp. 15-19.

<sup>14</sup> 黑爾德教授於 2004 年 10 月 20-21 日於政治大學進行「政治世界的現象學」系列哲學講座，對此有深論；另見黑爾德著，孫周興編之《世界現象學》，台北：左岸，2004 年。

的) 的基礎上可被帶近給人, 但前者不能完全被後者決定, 並且 *êthos* 需要 *kairos* 來成全。

若不能藉著反思判斷力向他人的視域開放, 就有著朝向暴力的傾向。不以暴力強加他人, 而承認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特殊世界中有其位置, 它就要歸功於一種名之曰「羞怯」(*aidos*) 的情感。惟羞怯要演變為倫理習俗或德行, 從偶然轉為持續的, 它才可政治世界的基礎。和公共生活對照的居家生活世界之所以值得重視, 因它是羞怯倫理所發生之地。從歷史中觀察, 畏怯的情感實已根植於世界之眾人心裡, 它有機會被習慣化為民主政治世界倫理的基礎。

對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時期而言, 基礎存有論的課題先於理論與實踐的課題, 「自然是什麼?」與「善是什麼?」需以「人之開放性」課題為先決條件。在現實中往可能性開放是個 *Care* (*Sorge*) — 煩、憂心、牽掛 — 的問題。牽掛的整體性被傳統所分割: 人們要不是「首先侷限在理論的主體, 以便後來就實踐方面以一附加的倫理學去對之補充」, 就是「設定實踐的料理為事實的此有之原初與重要的方式」, 且認為「理論之存有論可能性歸於實踐的闕如」。<sup>15</sup> 但如何來看牽掛的整體性呢?

海德格以居住在存有近處是深思的人, 思維不是邏輯推算, 不是表象性的 (*representative*) 思維, 它是讓在場性的臨現 (*presentation*); 它又與居住不分開, 居住根本上是 *Care*, 也是 *Ethos*, 居住性 (沉思性) (*besinnendes*) 思維奠立真正倫理意義<sup>16</sup>。真正的倫理意義向無限的可能性敞

開, 以取得無盡豐富的意義。實踐與理論以此敞開性與意義豐富性為準則。晚期海德格對於科技化的反省即在於科技造成意義 (如因抽象理性對於人瞭解的) 束縛的突破。進言之, 藝術領域為人面對科技之本質做深思與折衝之處, 或科技的危險要由藝術拯救<sup>17</sup>。雖然在〈藝術作品起源〉裡海氏謂藝術品之製作基於世界與大地之彼此抗衡<sup>18</sup>, 但在 *Gelassenheit* 裡海氏以世界與大地是地帶 *Gegend* (*region*) 以及對立者 *Gegnet* (*opponent*), 它們對我們呈現退隱性, 而非相遇性; 「抗衡」成了世界與大地對我們之退隱或相遇。若世界與大地不是對立抗衡, 而是泰然任之 (*Gelassenheit*) 的話, 那麼世界與大地都將退隱我而去<sup>19</sup>; 惟在此藝術所揭示的意義才更趨無窮。

綜言之, 海德格根本上是將實踐 (*praxis*) 置於作為本真的技術之藝術基礎之上, 這也造成海德格將政治與藝術結合在一起 (鄂蘭強調其間的衝突), 而忽略了政治與實踐間的關係, 故而有其弟子鄂蘭對之所做的政治哲學思想改造<sup>20</sup>。

從整個討論來看, 海德格強調存有開顯式的倫理、藝術化的科技與政治 - 以回歸自然與存有; 鄂蘭強調人的存有為政

<sup>15</sup>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79, S. 316, 357.

<sup>16</sup> *Ethos* 與思維之關係見 Heidegger. *Über den Humanismus*, 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81, S.

45; 關於表象性與沉思性思維參考 Heidegger. "Die Zeit des Weltbildes", in: *Holzwege*, 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80, S. 73-110, 其中 S. 88-89; Heidegger. *Zollikoner Semonare*, 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94, S. 152-153.

<sup>17</sup> Heidegger.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Teil I*, Tübingen: Neske, 1967, S. 5-36, 其中 S. 34-36.

<sup>18</sup>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in: *Basic Writings: from Being and Time (1927) to The Task of Thinking (196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 pp. 139-212, 其中 p. 175.

<sup>19</sup> Heidegger. *Gelassenheit*, Pfullingen: Neske, 1992, S. 40.

<sup>20</sup> 參考 Dana R. Vill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7, 8, 其中 p. 219.

治之行動，但對話需要倫理（風俗習尚）為前提，科技再以之為條件；優納斯強調科技需對自然負責的倫理，政治以之為前提。除了其間的差異不再論述外，他們皆站在現象學的根本立場上，提出作為人為物的道德行為法則如何可呈現其自然性的問題，即如何使人為物像大自然一樣，成為自身意義的湧現者？這構成了現象學倫理學的存有論深刻意涵，將成為本研究計畫下個階段對胡塞爾探討的立足點。

#### 四、計畫成果自評

筆者探討了海德格、鄂蘭與優納斯因面對人存在之深度與由此被奠基出來的生命層面之廣度，提出了原初的與存有論的倫理學或價值觀。此乃在較宏觀的立場下所做的系譜性與比較性的研究。雖然在國外已有如Erio Jakob之 *Martin Heidegger und Hans Jonas: Die Metaphysik der Subjektivität und die Krise der technologischen Zivilisation*，Dana R. Villa之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Princeton，Richard Wolin之 *Heidegger's Children: Hannah Arendt, Karl Löwith, Hans Jonas, and Herbert Marcuse* 等分別探討優納斯，鄂蘭與海德格之間的系譜關係，但他們皆並未繼續回溯至與胡塞爾倫理學的關係，當然更未在胡塞爾現象學從靜態與認識論立場，轉到發生或存有論的立場，以去有效保障對現象學倫理學的根本要求中，去探尋其與海德格等之倫理思想的異同與關連。

由於第一年的研究是對於海德格、鄂蘭與優納斯之觀點做一宏觀的系譜與比較性處理，在探討過程中當然引發出爾後更精細處理各家思想的必要，特別是鄂蘭之 *The Life of Mind* (1976) 所處理之對於 vita

activa 與 vita contemplativa 進行綜合的討論。

#### 五、參考文獻

Arendt, Hannah. *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en Leben*, München /Zürich: Piper, 1999.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79.

Heidegger, Martin. *Über den Humanismus*, 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81.

Heidegger, Martin.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Teil I*, Tübingen: Neske, 1967, S. 5-36.

Heidegger, Martin.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in: *Basic Writings: from Being and Time (1927) to The Task of Thinking (196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 pp. 139-212.

Heidegger, Martin. “Die Zeit des Weltbildes”, in: *Holzwege*, 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80, S. 73-110.

Heidegger, Martin. *Gelassenheit*, Pfullingen: Neske, 1992.

Heidegger, Martin. *Zollikoner Semonare*, 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94.

Jakob, Erio. *Martin Heidegger und Hans Jonas: Die Metaphysik der Subjektivität und die Krise der technologischen Zivilisation*, Tübingen: Francke, 1996.

Jonas, Hans. *Das Prinzip der Verantwortung*,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7.

Jonas, Hans.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Levy, David J.. *Hans Jonas – The Integrity of Thinking*,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

Villa, Dana R..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Villa, Dana R.. “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rendt’s political thought”, in: Villa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1.

Wolin, Richard. *Heidegger's Children: Hannah Arendt, Karl Löwith, Hans Jonas, and Herbert Marcuse*, Princeton/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黑爾德：「政治世界的現象學」系列哲學講座，2004年10月20-21日於政治大學。

黑爾德（孫周興編）：《世界現象學》，台北：左岸，2004年。